

影响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决策因素的特征分析

柳建平

(西北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本文利用对甘肃省 10 个贫困村的调查资料, 运用统计描述和比较分析的方法, 对影响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决策因素的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的直接动因是家庭贫困和劳力过剩; 就个体特征而言, 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状况非常重要; 就家庭因素来说, 人口、劳力和耕地规模都对劳动力的外出决策有正向影响, 家庭上学子女数对其成员外出决策有反向影响, 家庭富裕程度、户主文化程度对劳动力外出决策有着明显的倒 U 型影响。

关键词: 贫困地区; 农村劳动力; 流动决策; 特征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0) 05-0008-07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cision of Migration of Rural Labor Force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LIU Jian-ping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in 10 poverty villages in Gansu province, through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rural labors' migration decision in poverty areas from the several aspects: reasons of labor mobility,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s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outflow pla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poor and labor surplus are the direct motivation for the rural labor outflow the poverty-stricken area; human capital is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among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s. Among family factors, population, labor and farmland scale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the migration decision; the number of school children and the other member's migration decision have negative effect on the migration decision. The effect of the household's economic status and the education level of the head of the household appear updown U pattern.

Keywords: poverty-stricken areas; rural labor mobility; migration decision; general features

由于长期受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影响, 我国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具有中国特色, 即这种迁移一般不涉及户籍变动, 只是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临时就业、间或回乡, 因而称之为“人口流动”或“劳动力流动”。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制度背景下, 因国家经济发展阶段、战略及政策的不同及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 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特点。本文利用对甘肃省 10

收稿日期: 2009-07-09; 修订日期: 2010-06-29

作者简介: 柳建平 (1965-), 甘肃会宁人, 西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数量经济学。

个贫困村的调查资料，通过统计描述和比较分析的方式，从流动动因、流动者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等方面，对影响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决策因素的特征作出分析。

一、调查简要

2006 年底至 2007 年初，西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部分研究生和西北师范大学“三农社”的部分人员对甘肃省白银市、临夏市与天水市的 10 个村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村庄属典型的西北贫困山区，人均纯收入 2006 年只有 1765.9 元/人，相当于全国和甘肃平均水平的 54.3 % 与 89.2 %，人均支出 932.6 元/人，相当于全国和甘肃平均水平的 22.6 % 和 51.3 %。

调查以随机到户访谈形式为主，共完成问卷 1000 份，其中有效问卷 871 份，涉及当前有外出劳动力的农户 729 户，没有外出劳动力的农户 142 户；有回流户 113 户；涉及总人口 4442 人，劳动力总数 2416 人，其中当前外出打工人数为 1057 人，占劳动力总数的 44%。以上情况基本反应了在调查地区，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①。

二、流动动因

从已有的文献资料看，学术界普遍认为农村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和城乡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最主要原因。如陈吉元等人认为城市的高收入和农民的高失业率导致了农民流入城市^[1]，李荣时的研究认为人口流动的微观原因是农村就业不充分和城市劳动报酬高^[2]，李强的研究认为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和收入差异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最主要原因^[3]。而蔡昉等人的研究认为城乡收入差距虽然是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迁移的持续动力，但不是唯一的，其中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也为迁移提供了重要激励^[4]。从对回流动因的研究来看，多数研究是从制度等宏观因素方面寻求解释，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一些研究则注重对个体行为的微观实证分析，如白南生等人通过对安徽和四川一些农户调查资料的研究，认为农民工因外地就业困难导致的被动回流呈上升趋势，因个人或家庭原因的回流呈下降趋势^[5]。而一些研究认为，在目的地的“失败”并不是回流的决定性因素，因家庭原因逼迫回流的成为回流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是失败者，而成功者在回流者中占很小的比重^[6]。以上这些结论的得出，多数是基于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因而具有相当程度的说服力。以下我们从农民自己所认为的原因分析农村劳动力外出或回流的直接动机（见表 1）。

首先，外出原因的统计结果显示，“家里缺钱，挣钱补贴家用”和“耕地太少，在家无事可干”两个选项所占的比率最高，前者为 64.4%、后者为 31.2%。这一结果说明家庭贫

表 1 外出、不外出和回流的原因		%
项目	比率	
外出原因		
家里缺钱，挣钱补贴家用	64.4	
耕地太少，在家无事可干	31.2	
学生教育费用高，需挣钱供其上学	16.9	
出去见世面、长见识，寻找发展机会	15.1	
家乡太穷，想离开农村	11.4	
盖房子娶媳妇	8.6	
家里不缺钱，想多挣点钱	6.5	
务农辛苦、收入低，不想务农	6.2	
出去学技术	5.1	
外出务工经商是年轻人有出息的标志	4.4	
一直念书，不懂农活	2.8	
不外出原因		
家中没有多余劳力	59.8	
家里离不开	31.9	
没文化	5.6	
家里不缺钱	2.5	
打工太辛苦	3.3	
回流的原因		
适宜工作难找，暂时回家	33.5	
孩子上学，需回家管教	15.4	
家里有病人，需回家照顾	5.8	
年龄大了，回家种田安稳	5.6	
政策好了，不如回家种田	2.1	

注：①三项调查均为多选题；

②由于“不外出的原因”和“回流的原因”部分数据缺省，比率总和都未超出 100%。

① 本文所说的劳动力流动，专指农村劳动力外出在乡镇以上行政区就业，且流动时间在 1 个月以上的人口流动。

困是农村劳动力产生外出动机的直接原因，而耕地太少所对应的劳动力剩余则为劳动力外出提供了一个必备条件。这也充分说明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和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外出的主要原因。就调查村庄的经济状况而言，调查的 10 个村中有 6 个村属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人均收入更低，仅为 1529 元。在这 6 个村的 348 个样本中，有 78 户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标准，涉及人口 415 人，贫困发生率为 22.83%，远高于 2006 年甘肃省 6.7% 的贫困发生率^[7]。再从这些村庄耕地与劳动力的匹配来看，若按一个全劳动力较为适度的水浇地、旱川地、山地的匹配分别为 2、4、8 亩推算，调查村庄户均需农业劳动力最多为 1.6 人，这一需求与户均劳动力 2.8 人相比，最为保守的劳动力剩余率为 43%。由此可见，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的直接动因是家庭贫困和劳动力过剩。

此外，调查结果还显示了劳动力外出动因的复杂性。选项“学生教育费用高，需挣钱供其上学”的比率为 16.9%，说明在贫困地区，教育费用相对较高也是迫使部分家庭户主选择外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相对较高的教育费用也可能促使部分已有劳动能力的初中学生放弃学业，转入外出行列。后面的选项大多与年轻劳动力有关，如“出去见世面、长见识，寻找发展机会”的选率为 15.1%，约占 28 岁以下外出劳动力的 60%，说明一部分年轻劳动力外出的动机并不仅仅是迫于贫困，而是具有积极的个体发展意向^①。

其次，从不外出原因的统计结果看，“家中没有多余劳力”和“家里离不开”选项的比率最高，分别为 59.8% 和 31.9%。“家中没有多余劳力”选率最高似乎和前述劳动力剩余的结论矛盾，而且从分类比较来看，无外出户和有外出户家庭的平均农业劳动力剩余度分别为 31.4% 和 46.1%。虽然前者比后者低了近 15 个百分点，但从绝对意义上来说，仍然存在着农业劳动力剩余。其实这一结论恰好反映了外出与不外出样本之间存在的一个重要差异，即之所以成为无外出户的主要原因就是“家中没有多余劳力”。对这一结论需要从无外出户具有的以下几个特点做进一步分析：①从从事非农经营的角度看，兼营非农经营是无外出户的一个显著特征。仅从 6 个最为贫困样本村的非农经营状况来看（见表 2），无外出户的非农经营收入，无论哪一个收入分组都远高于有外出户，特别是无外出户较高收入组（C 组），占无外出户的 34.6%，人均非农经营收入为 1437 元，而有外出户的该项收入仅为 232 元。说明在调查地区高收入组农户剩余劳动力主要以非农经营为主，因而很少参与外出打工^[8]。②在贫困地区存在的教育与外出的相互替代现象也是导致部分家庭没有劳动力外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我们在后文中将做进一步的专门分析。

表 2 6 个村以人均收入分组的有外出户和无外出户非农经营状况比较

按收入分组	户数（户）	户所占比重（%）	非农经营收入（元/年）	非农经营对总收入贡献度（%）	农业收入贡献度（%）	打工收入贡献度（%）
有外出户	296	100	177.52	10.94	24.39	64.67
A 组：≤693 元	49	16.6	56.22	12.58	52.30	35.13
B 组：693～1000 元	44	14.8	77.14	9.18	31.63	59.19
C 组：>1000 元	203	68.6	231.53	11.01	22.21	66.78
无外出户	52	100	594.71	63.13	36.87	—
A 组：≤693 元	29	55.8	119.63	31.52	68.47	—
B 组：693～1000 元	5	9.6	656.00	83.67	16.33	—
C 组：>1000 元	18	34.6	1436.63	71.43	28.57	—

注：①贫困人口指按户人均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标准 693 元的人口数。

②6 个村分别为：川口村、梁庄村、团结村、韩赵家村、涧沟村和钱家坝村。

① 我们将出生在 1978 年以前、调查时年龄在 28 岁以上的流动者划分为第一代流动者，将出生在 1978 年以后、调查时年龄在 28 岁以下（包括 28 岁）的流动者划分为新一代流动者。这样划分的根据是：第一，成长背景和社会阅历不同。他们分别成长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不同的时代，第一代流动者经历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更早、更多的流动经历，身上肩负着更多的责任。第二，流动行为存在很大差异。新一代流动者的流动背景、流动条件、流动动因、流动行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论从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社会背景差异各方面来看，他们已是全新的一代流动者。

最后，从回流原因的统计结果看，“适宜工作难找，暂时回家”选项的选率最高，为 33.5%，其次为“孩子上学，需回家管教”和“家里有病人，需回家照顾”选项，分别为 15.4% 和 5.8%，两项合计为 21.2%， “年龄大了，回家种田安稳”选项的比率为 5.6%， “政策好了，不如回家种田”选项的比率最低，为 2.1%。可见，回流的主要原因在于外出者对外出工作（收入）的不满意，并且仅将回流作为暂时性决策。同时也看到，家庭因素是影响外出者回流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不具有长期性，可能随着这些短期因素的消失，回流者仍具有外出的可能。年龄是影响回流的又一重要因素，且不具有可逆性，即第一代流动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将陆续返回家乡，并将在家乡长期定居。

三、影响流动决策的个体因素特征

动机是行为发生的前提条件，仅有流动动机还不足以导致流动行为的发生。劳动者最终做出外出、不外出或回流的决策，来源于诸多条件的限制，其中劳动者个体特征是首要因素。根据我们的调查资料，以下对外出、不外出和回流劳动力的个体特征作出比较（见表 3）。

第一，从年龄看，外出和未外出劳动力都以 28 岁以上者居多，前者占其总数的 55.7%，后者为 53.9%，但他们的平均年龄差异明显，前者的平均年龄为 31 岁，后者为 39 岁；而在

回流劳动力中，28 岁以上者所占比例较大，为 78.2%。以上反映出外出者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留守劳动力年龄偏大，对外出者来说，年龄越大就越倾向于回流。

第二，从性别及婚姻状况看，外出劳动力中男性占 87.2%，其中已婚者占 62.48%；外出劳动力中女性仅占 12.8%，且已婚者比例极低，仅为 2.54%。回流劳动力中，已婚男性占总数的 78%，未婚占 15%，两项合计为 93%，女性回流者仅占总数的 7%。这些比例和其他反映全国或一些人口迁移大省如安徽、四川、湖北情况的统计结果有较大差别。如蔡昉根据 1990 年人口普查数据得到男性移民的比例为 55%^[1]；杜鹰的研究表明，1994 年四川的外出移民中男性占 69.3%，安徽的外出移民中男性占 65.2%^[10]；蔡昉 2005 年的研究中反映出，1997 年西部贫困地区外出农村劳动力中，男性占 68.2%，2000 年男性占 70.9%，并认为男性劳动力不仅在迁移数量上远远大于女性，还体现在数量增长上更快^[11]，这一变化趋势更符合我们所得到的数据。可见，男性比例绝对高于女性比例是西部贫困地区外出劳动力个体特征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三，从文化程度看，外出劳动力中以初中文化程度居多，占 64.1%；其次为小学文化程度，占 25.7%；外出劳动力中文化程度是文盲和高中（含中专）的所占比率很小，分别为 5.2% 和 4.9%。在不外出劳动力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所占比例最高，为 45.5%，这一比例比外出劳动力要低近 20 个百分点。其次为小学文化程度，所占比例为 30.8%，比外出劳动力高 5 个百分点。但在高中文化程度层次，不外出劳动力的这一比例要高出外出劳动力 10 个百分点。这一结果和赵耀辉的结论更为相近。赵耀辉认为，更高的教育水平并不能显著提高外出的概率，而对劳动力的就近非农就业具有显著作用^[12]。我们的调查分析也发现，在贫困农村地区存在着两个极端，一是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不倾向于外出务工，而倾向于农村非农经营，农

表 3 外出、不外出、回流劳动力个体特征的比较 %

分项		外出劳动力	不外出劳动力	回流劳动力
年龄（岁）	16 ~ 27	44.3	46.1	21.8
	28 ~ 45	55.7	53.9	78.2
性别	男	87.2	25.7	93
	女	12.8	74.3	7
婚姻状况	已婚	65	59.5	81
	未婚	35	40.5	19
文化程度	文盲	5.2	8.4	22.2
	小学	25.7	30.8	47.6
	初中	64.1	45.5	28.5
	高中或中专	4.9	15.3	1.7

村非农经营者中绝大多数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二是文化程度是小学或文盲的劳动力也不倾向于外出务工，大多数以农业为主。从回流劳动力的文化程度的分布来看，比例最高者为小学文化程度，其次为初中文化程度和文盲，高中及以上学历者最低占 1.7%，由此可看出，外出者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上者不倾向于回流。

第四，从以年龄分段的个体特征比较来看（见表 4），28 岁以上流动者以男性、已婚为主，女性和没有结婚者所占比例比较低，并且绝大多数都有子女。相比较，28 岁及以下流动者最大的特点是男女都以未婚为主，并且女性流动者所占比例明显提高，未婚女性的比例高于男性。就受教育水平来看，虽然外出者都以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为主，但 28 岁以下流动者

表 4 外出流动者分年龄段个人特征		%	
项目		28 岁以上	28 岁及以下
受教育水平	文盲	8.33	0.93
	小学	30.15	19.31
	初中	56.62	71.34
	高中及以上	4.90	8.41
已婚比例	男	95.88	33.06
	女	88.54	11.50
有子女比例	有子女	93.58	21.67

中小学文化程度所占比例下降，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所占比例明显上升。可见，28 岁以下流动者，即新一代流动者最显著的特征是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未婚者所占比例较高，女性流动者明显增加。

四、影响劳动力外出决策的家庭因素特征

从已有研究看，家庭因素是影响劳动力流动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以下我们从户主文化程度、家庭人口、劳动力规模、耕地以及收入和支出等方面，通过对有外出户和无外出户家庭特征及差异的比较，分析在西部贫困地区家庭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可能影响。有关数据资料的统计分类比较见表 5。

第一，从户主文化程度看，其对流动决策的影响呈现出倒 U 型特征。有外出户户主主要分布在小学文化层次，其次为初中文化程度，其分布具有明显的偏态。无外出户户主具有对称分布的特点，在小学和初中层次各占 31.7% 和 34.2%，两项合计 65.9%，比有外出户户主在这两项上合计要低 11 个百分点。在文盲层次，无外出户户主所占比例稍高于有外出户户主，而在高中文化层次，无外出户户主所占比例远高于有外出户。这些特点反映出，户主文化程度对家庭成员外出决策的影响有着倒 U 型特征，特别当户主受教育水平达到高中层次时，家庭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就会减小。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户主文化程度与家庭收入及户主权威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①；二是户主文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让其子女接受更高的教育；三是农村家庭子女在初中毕业后，在继续上学和就业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效应”^②。

第二，从家庭人口、劳动力规模和耕地的特征来看，有外出户在这三个指标上都要高于无外出户。从实证结果来看，这三个因素对劳动力外出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至于家庭人口和劳动力规模对外出决策正向影响的结论，与其他众多研究结论相符。而家庭耕地面积对劳动力外出决策也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与有些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般认为土地匮乏是劳动力外出的重要动机，但在西部贫困地区，耕地虽然是其生存的基本保障，只是由于自然条件差，土地的收成

① 我们利用该样本资料，以农户家庭收入为因变量，以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上学人数及家庭拥有耕地面积为自变量，经逐步回归所得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人数、户主年龄与户主受教育水平三者对农户年收入有着显著的影响，且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户年收入的边际影响最为重要。

② 我们利用该样本资料，以是否外出为因变量，以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劳动力人数、上学人数、拥有耕地面积和年收入为自变量，选用 Backward Conditional 方法，经逐步剔除变量所得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表明，家庭人口、劳动力人数和耕地规模对劳动力外出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庭上学子女数对劳动力外出决策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

及保障功能主要依赖于“天时”，农业的自然风险很高，人均耕地面积多往往意味着该村庄的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都较低，农户劳动力配置往往是在能够保证其基本生存需要的前提下，更具有外出打工的倾向。由表 5 可见，有外出户户均耕地 6.71 亩，其中水浇地、旱川地、山地的比例分别为 24.4%、28.7%、46.7%，无外出户户均耕地 5.48 亩，其中水浇地、旱川地、山地的比例分别为 45.9%、20.9%、33.2%。明显可见，前者的耕地主要是多在收成风险大的山地方面，而后的户均水浇地面积要高于前者 53.7%。户均（人均）耕地面积多，往往意味着村庄的农业生产条件较差，村庄普遍贫困，流动比率相对较高。

第三，家庭子女上学对外出决策的影响，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直观的经验应当是：上学子女人数多，经济压力大（调查时期国家支持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免费政策还未实施），家庭劳动力越具有外出打工的倾向，但实证结果却相反。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从两类家庭上学子女就学的结构比例来看，有外出家庭子女分别在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学校就读的比例分别为 24.4%、47.8%、27.8%，而无外出家庭的这一比例分别为 44.8%、33.1%、22.1%。显然，有外出家庭上学子女主要集中在初中，而无外出家庭上学子女主要集中在小学，因而就经济压力来说，前者大于后者，并

表 5 外出劳动力、不外出劳动力、回流劳动力家庭特征比较				
项目		有外出户	无外出户	有回流户
户主文化程度（%）	文盲	15.51	19.51	23.50
	小学	48.66	31.71	45.30
	初中	28.34	34.15	26.80
	高中以上	7.49	14.63	4.40
户均耕地面积（公顷）	水浇地	0.11	0.17	0.12
	旱川地	0.13	0.08	0.13
	山地	0.21	0.12	0.17
家庭人口构成（人）	人口数	5.10	4.83	5.00
	劳动力数	2.97	2.29	2.50
	上学子女数	1.24	1.41	0.74
家庭收入构成（%）	农业收入	31.20	42.55	44.30
	务工收入	56.80	1.60	5.60
	非农经营收入	8.70	36.10	28.90
	其他	3.30	19.74	21.10
上学子女数结构比例（%）	小学	24.40	44.80	36.50
	初中	47.80	33.10	29.80
	高中及以上	27.80	21.10	33.70
支出结构（%）	生活费支出	31.15	25.85	23.50
	子女教育费用	25.99	34.02	28.20
	医疗费用	15.88	18.27	20.60
	农业投入	22.36	19.52	24.00
	其他	4.62	2.33	3.70

且小学生相比初中生更需要父母的照顾。二是从两类农户家庭人口状况的比较来看，有外出户户均劳动力和上学子女数分别为 2.97 和 1.24，而无外出户的这两个数据分别为 2.29 和 1.41。可见，对劳动力人数较少，而上学子女数较多的家庭来说，当前就是缺少能够参与外出的劳动力。这一情况也与调查问卷中“不外出的原因”一项的统计结果一致，有近 60% 的无外出户认为，他们之所以没有成员外出务工是因为“家中没有多余劳力”。

第四，从家庭收入及结构来看，有外出户的平均年收入明显高于无外出户，前者的户均收入为 9013 元，人均收入为 1767 元，后者的户均收入为 7565，人均收入为 1566 元。但这一特点并不意味着在贫困地区家庭收入越高，成员就越具有外出的倾向，因为对多数外出户来说，收入较高是结果而非原因。实际上，在贫困地区经济收入处于中间层次的家庭是构成外出户的主体，而越处于两头的家庭越不倾向于外出。

第五，就回流者的家庭特征来看，最为明显的表现在家庭子女数、收入结构和支出结构方面。回流者家庭的上学子女数明显少于其他两类农户，而上学子女数的分布较为均匀；从支出结构看，回流者家庭的医疗支出和农业支出都明显高于其他家庭。虽然由这些特征还难以断定其对回流决策的具体影响，但也可以印证或看出一些端倪，如上学子女数少，可能与回流者的年龄大有关，家庭医疗支出比例高，说明照顾生病家人也可能是回流的一个原因。

五、结论

本研究表明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的直接动因是源自农村内部的家庭贫困和劳动力过剩,但劳动力外出决策的选择又确实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且这些因素还表现出了一定的特殊性。就农民个体特征而言,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状况非常重要,但当个体达到高中文化程度时,他们更愿意从事农村非农工作;就农民家庭因素来说,家庭人口、劳动力和耕地规模都对劳动力的外出决策有着一定的正向影响,特别需重视的是农民家庭上学子女数对其成员外出决策有着重要的反向影响,而家庭富裕程度、户主文化程度对劳动力外出决策有着明显的倒 U 型影响。从整体来看,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仍处于一个低层次阶段,流动的主要目标是缓解家庭贫困,改善家庭生活状况,方式上多采取循环式城市临时就业,真正的城市生活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非常遥远。面对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不平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及地区发展差距,劳动力外出就业已成为避免贫困地区农民被彻底边缘化的一个重要策略,应引起政策制定者及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

参考文献:

- [1] 陈吉元.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2] 李荣时. 对当前我国农村人口流动的再认识 [J]. 人口研究, 1996, (6).
- [3] 李强. 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1).
- [4] 蔡昉, 都阳. 迁移的双重动因及其政策含义 [A]. 李培林. 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5] 白南生, 何宇鹏. 回乡, 还是进城? ——中国农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 [A]. 李培林. 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6] 王美艳. 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经济影响的研究综述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6, (3).
- [7] 张永丽, 杨志权.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的影响——来自甘肃省十个样本村的调查与分析 [J]. 西北人口, 2008, (2).
- [8] 张永丽, 王文娟.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缓解贫困——基于甘肃省贫困山区的实证分析 [J]. 人口与经济, 2008, (5).
- [9] 蔡昉. 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经济学分析 [J].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6 年春季卷.
- [10] 杜鹰. 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宏观背景分析 [C]. 蔡昉, 白南生. 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11] 蔡昉, 王德文等. 农村发展与增加农民收入 [M]. 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6.
- [12] 赵耀辉.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以四川省为基础的研究 [J]. 经济研究, 1997, (2).
- [13] 柳建平, 张永丽.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缓解贫困的实证分析 [J]. 西北人口, 2008, (3).

责任编辑 童玉芬]